

的處於工作年齡的婦女參加了勞動市場，這一數字在過去的25年幾乎沒有變化。

## 香港會是個特別的例子嗎？

香港在近年來，湧現一批優秀的女性榜樣，無論是在商界（港版淡馬錫首位女性CEO陳家齊），政界（前特首林鄭月娥），還是文化界。

尤其在男女的勞動參與率上，與大家慣性的思維相反，香港男性勞動人口數量，甚至低於女性。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出版《香港的女性及男性—主要統計數字(2022年版)》，2021年女性勞動人口達194.73萬人，而同期的男性勞動人口僅有192.31萬人。其中，女性勞動人口的參與率亦自1991年起總體上升，由1991年的47.9%升至去年的54.2%；男性則大致下降，由1991年的78.9%跌至2021年的65.8%，顯示在香港，兩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差別逐步收窄。

這讓許多人大讚“女傭釋放了香港女性勞動力”，但諷刺的是，這一觀點，反而恰恰暗示了“家庭工作理應由女性擔當”的思維定勢，從思想上進一步肯定了“女性應承擔更多無償的家庭照顧工作”的論斷。

此外，我們還要看到另一個數據，在香港，男性與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幾乎相似。2021年，香港未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70.2%，男為69.1%，即未婚女性勞動參與率數字比男性還高。

所以，很不幸地，從上述方面綜合來看，香港不僅不特殊，甚至再次佐證了戈爾丁的研究——“已婚女性在職場上與同齡男性及未結婚（生育）的同齡女性的差距，是從生育首個子女後開始出現並拉闊的。”

那麼如果我們從最能體現女性地位指標的政治實權領域來看呢？

畢竟近年來，越來越多的香港女性成為政治實權領域的主官，這是女性擊碎職場天花板的力證。

確實，香港公務員體系中，女性的首長級人員數目，從1991年年中的129位大幅增加至2022年年中572名，女性首長佔到總人數的41.1%。但這意味着香港女性享有高度的政治地位嗎？實情恰恰相反，在港府“政治委任制度”下，需由國務院任命的“主要官員”共26人，其中女性官員僅有6人，佔比僅為23%。這個數字與前述“首長級人員”中的女性佔比（41.1%）數據完全不對等，顯示香港女性在“政治實

權”領域中，仍然與男性有相當大的差距。

有觀點認為，上述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“女性在職場上常當副手”思路類似，這批港府中的職業女性憑藉自身努力，成為今日港府的中流砥柱，但並非“實權派”，顯示香港政界仍以男性為主導，他們選擇女性擔任自己的副手（或港府公務員體系中的秘書長職位），實則更可能是認為女性“更加能幹且對自身不具備高度威脅性”，而這亦是另一種含蓄的“正向歧視”。（本段觀點引用自BBC報道《特稿：香港女性地位的矛盾現象》）。

## 但她也證明了性別差距會隨時間而變化

但暴露問題，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開端。在記者看來，這也是戈爾丁性別經濟學獲獎的特殊意義之一。

儘管在前文中，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“伴隨着經濟成長和勞動力市場中女性比例的上升，但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長時間內幾乎沒有縮小”這個結論，但從戈爾丁的研究中，記者也欣喜地發現：“性別差距會隨時間而變化。”

戈爾丁在自己的新書中，將20世紀初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分成了五個組別，研究世代的演變歷程。她發現，美國的女性大學畢業生，一個世紀前佔年輕女性的比例不到3%，但如今，女性大學畢業生幾乎佔美國20多歲女性總數的45%。一個世紀前，很少有女性有勇氣和經濟能力掙脫壓抑的婚姻，但在其第四組別研究對象中，已經有不少選擇推遲婚姻和家庭，以事業為先。第五組成員則進一步提高了結婚年齡：美國副總統的哈里斯，更是選擇在50歲結婚……

以上這些或許未必令人感到欣喜的轉變，都是女性在不斷向職場天花板發起衝擊的力證，但與此同時，如何降低職場女性的婚姻、生育成本，讓女性不必為獲取高職位而壓縮個人需求，或許才是戈爾丁的研究中，更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。

而鼓勵男性與女性平均承擔無償家務與護理工作，打破對男女分工的思維定勢，甚至不再因為女性的生理弱勢，想方設法在職場以“為你好”的形式，給予女性更多“特殊”照顧，都是讓女性婚姻、生育成本不再如此高昂的解決之道。📖



掃碼閱讀原文